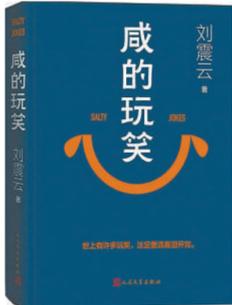


书评

《咸的玩笑》是作家刘震云继2021年出版的《一日三秋》后时隔四年完成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延续了刘震云一贯的幽默风格,讲述了普通中学教师杜太白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从教师到乡村红喜事司仪,再到街头小贩,主人公在生活的起落中不断挣扎与重生。

与刘震云早期的作品相比,《咸的玩笑》不再局限于对社会现实的冷峻剖析,而是将目光投向普通人在生活重压下的精神韧性。作品通过荒诞而苦涩的



《咸的玩笑》

初中时第一次读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只记得英子经历过几场生离死别,并未读出什么特别之处。前些天逛书店时又看到了这本书,便顺手买回家。再次翻开这本书时,我已至中年,此时才看出书中潜藏的另一层叙事:旧时代对女性的束缚,以及她们或跟跑挣扎或决然出走的人生轨迹。

全书最令人震撼的,莫过于《惠安馆》里的“疯子”秀贞。秀贞与大学生思康相恋并独自生下女儿小桂子后,母亲为保全颜面,把小桂子送走,彻底剥夺了秀贞做母亲的资格。从那以后,秀贞终日活在思念“小桂子”和“思康”的呓语中,成为人们口中的“疯子”。她的失常本是心理遭受创伤的结果,却成为社会将她边缘化的理由,街坊邻居纷纷躲着她,不许孩子们靠近她。只有英子不怕她,偷偷走进院子听她倾诉。英子的到来给秀贞

故事情节,展现了平凡人身上迸发出的惊人生命力。这种创作视角的转变,既体现了刘震云个人创作风格的变化,也展现了他对普通人精神世界的深刻理解。

幽默是刘震云作品的鲜明特色,但其内涵经历了明显的变化。在早期作品《一地鸡毛》和《塔铺》中,他的幽默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直指人性的困境,笑声背后往往带着无奈与苦涩。而到了《咸的玩笑》,这种幽默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带有距离感的“冷幽默”转变为充满理解的“暖幽默”。

这种“暖幽默”并非对苦难的轻描淡写,而是改变了看待苦难的态度。书中杜太白用主持红白喜事的经验化解街头纠纷,爱打听隐私的老辛把自己的好奇心包装成“忧国忧民”的使命,这些情节引发的笑声不再是居高临下的嘲讽,而是感同身受的心会一笑。这反映了作者叙事立场的转变:从社会现象的批判者转变为普通人的理解者。这种理解具有建设性,不仅揭示伤痕,更关注生命自我修复的力量,最终达成情感的升华。

书名中的“咸”是全书的核心

意象和哲学支点。“咸”,是泪水与汗水的味道,是人在生存压力下最本能的味觉体验。小说结尾处,杜太白尝到自己的眼泪是咸的,这一体验促使他完成了对个体命运苦涩程度的最终确认。但刘震云的写作意图不止于呈现苦难,他通过“咸”这个意象构建了一个深刻的隐喻:生活就像一个巨大的蒸发皿,其中苦涩的水分(苦难与压力)终将蒸发,而留在皿壁上的,是晶莹的结晶——盐。

这个隐喻具有关键意义。由此,“咸”从一个象征苦难的标志性符号,转变为充满辩证意味的存在。它既是外部压力留下的痕迹,也是生命内在活力的证明。作者借此表达了一个重要观点:生活的意义或许不在于逃避苦涩,而在于如何通过自身经历和思考,将这些不可避免

的滋味转化为有价值的东西。小说中的人物,正是在品尝生活的苦涩后,或沉默隐忍,或保持热情,最终形成了独特的生命结晶——人性中最可贵的韧性。

《咸的玩笑》展现了一种独特的韧性,这是一种扎根于平凡市井生活的坚韧力量。刘震云用温

暖的笔触,刻画了一群闪耀着独特光芒的小人物,这些人物在物质困境中依然保持着精神世界的丰富与活力。杜太白就是这种韧性的典型代表。他的职业变迁看似是妥协与落魄,实则体现了一种主动调整与精神成长。书中的配角们同样散发着温暖的光芒:痴迷于研究兵马俑的裁缝老殷,他的专注超越了功利目的,达到了匠人与梦想家的统一;自称“第欧根尼”的冥想馆主申时行,用看似荒诞的方式执着追求着古典精神生活;卖糖葫芦的老辛,在平凡生活中构建着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这些散落在生活角落的执着与热爱,能够成为抵抗生命同质化与虚无感的珍贵力量。这些微小光芒的相互映照,构成了一条温暖的精神星河,为生存的韧性提供了最真实、最丰富的滋养。

小说通过“死扣”与“活扣”这一对生动的比喻,深刻揭示了韧性的本质。当杜太白遭遇突如其来,活扣的打击而陷入困境时,他的生活就像被系上了一个“死扣”,越是挣扎,被束缚得就越紧。这种状态生动地展现了人生中那些看

似无解的困境。而韧性则体现在系“活扣”的智慧上。“活扣”不是一把能解开所有难题的万能钥匙,而是一种内在的弹性、一种与命运和解的态度、一种“给时间以时间”的耐心。正如刘震云在书中所写:“面对生活的玩笑,我们要给时间一点时间,因为时间唯一相信的,就是变化本身。”

小说在生活的“死扣”处,系上一个充满理解与释怀的“活扣”,这也是刘震云向读者传递的生存哲学:真正的勇气或许不在于硬碰硬式的对抗,而在于在起伏中坚守认真生活的节奏,不敷衍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小说的结尾写道:“世界各地,不同的街道上,街上走着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伤痕,大家都辛苦了。”读到这里,我不禁会心一笑。每个人都会突然被孤独感和无力感击中,生活的意外和玩笑总是突如其来。《咸的玩笑》告诉我们,韧性并非遥不可及,它就存在于我们面对生活苦涩时的坚持、对生活的热爱,以及留给自己的希望之中。生活或许是咸的,但认真活过、爱过、坚持过的生命,终能获得回甘。

阅评

中国传统文化对“理欲”关系的探索从未停歇。北宋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将天理与人欲置于对立维度;明清之际,王夫之“天理寓于人欲”、戴震“理存于欲”的主张逐步构建起理欲辩证统一的思想认知。明代剧作家汤显祖以《牡丹亭》为炬,点燃了“以情抗理”的文学烈焰。这部作品聚焦被封建礼教严格管束的少女杜丽娘“慕色怀春、一梦生情、伤情而逝、死而复生、自主成婚”的核心叙事,成为推动“理欲之辨”持续深化的重要文学实践,让理欲探索得以传承与发展。

《牡丹亭》中,杜丽娘正值怀春之年,墙外迎客的铜铃声拨动着她的情思。然而,父亲杜太守“手不许把秋干索拿,脚不许把花园路踏”、只许“玉镜台前插架书”的严苛礼教要求,母亲“远离小庭深院”“怕花妖木客寻常见”的谆谆规劝,让她虽对外界心生向往,却始终不敢逾越雷池半步。直至老儒陈最良讲解《诗经·关雎》,“君子好逑”一句悄然点醒了杜丽娘的春心,她顿生“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怀人幽怨”之感,由此开启了“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游园惊梦。这场梦,是她冲破礼教禁锢、追求主体意识的开教。游园时,《步步娇》《醉扶归》等曲牌的演唱如泣如诉,尽显她困锁香闺的沉闷,更展现出青春重压下的情感爆发。游园之后,杜丽娘为情殒命,一缕相思魂飞抵冥府。她在冥间不懈力争,终获阎罗殿“放你出了枉死城,随凤跟寻此人”的判词。复生后,面对朝堂诘问,父亲斥她为“花妖狐媚”,拒不认亲,她却无惧金殿威权,冲上御阶驾前勤对。面对“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指责,她以“臣妾受了柳梦梅再活之恩”为由辩解,自主成婚与忠孝之道相联结,彰显了对待爱情与婚姻自由的执着,完成了对封建礼教的坚定反抗。

不知是否先有《牡丹亭》之经典选段《游园惊梦》的惊天泣神,才有了《红楼梦》的幻天情海;是否先有杜丽娘的自由追求,才有了贾宝玉的封建叛逆——《红楼梦》对《牡丹亭》情有独钟,林黛玉闺中心动,薛宝琴题诗怀古。《红楼梦》第23回“两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中,林黛玉读《西厢记》,只是觉得“词句警人,余香满口”,而听到《牡丹亭》“原来侬笑嫣媚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便心旌摇曳,不能举步;又听到“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越发如醉如痴,兼唱“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甚至落泪难支。杜丽娘追求自由的至情,与林黛玉的深情高度契合,形成强烈的情感共鸣。第51回“薛小妹新编怀古诗胡庸医乱用虎狼药”中,薛宝琴作十首隐舍谜面的托古咏物诗,之十便是《梅花观怀古》,起首便云:“不在梅边在柳边,个中谁拾画婵娟?”直接化用杜丽娘“吟成豆蔻诗犹艳,睡足茶蘼梦也香”的故事。

《红楼梦》对《牡丹亭》的借鉴与转化,随处可见。从文本细节来看,《牡丹亭》中柳梦梅“凭依造化三分福,招接诗书一脉香”的自命不凡,与《红楼梦》中贾宝玉的题诗“烧埋柳絮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在措辞格调上形成呼应;杜丽娘“月冷断魂波动”的凄清意境,与林黛玉“冷月葬诗魂”的悲怆感一脉相承。在情感表达与精神内核上,这种关联更为深刻。杜丽娘“海天悠、问冰魂何处?玉杵秋空,凭谁寄药把嫦娥?甚西风吹梦无踪!”的怅惘追问,与《红楼梦》中《葬花吟》“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天尽头,何处有香丘?”的迷茫慨叹,均以浓烈的情感抒发了对现实困境的不满,感情越浓烈、心境越凄切、抗争越坚决。更进一步的是,《红楼梦》继承了《牡丹亭》的反叛内核,并将其拓展深化——不再局限于个体对理学的抗争,而是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的制度、宗法与婚姻体系。贾宝玉身上的封建叛逆精神,与杜丽娘突破理学束缚的抗争一样,都闪耀着思想光芒。

当自由之花在后花园肆意绽放的时候,它不仅是一段爱情传奇,更带有历史长风拂过的痕迹。叶嘉莹在《寄生草》中概括了中国文化记忆:“映危栏一片斜阳暮,绕长堤两行垂柳疏,看长江浩浩流难住,对青山点点愁无数。问征鸿字字归何处?倦则得满天雁踏遍少年游,向人间种棵相思树。”《牡丹亭》这棵相思树,扎根于纷繁厚重的历史土壤,向着人性的天空,长出生机勃勃的自由之花。而《红楼梦》则将这株花树的根系延展至更广阔的社会土壤,让至情与叛逆的种子,在文学的长河里代代生长。

传统理欲之辨的至情书写

孙全喜

走出城南的三条路

孙玉晔

的生命增添了一丝希望,她曾拉着英子问:“人家都说我得了疯病,你说我是不是疯子?疯子都满地捡东西吃,乱打人,我怎么会是疯子?”那凌乱的话语里,藏着一个清晰的念头:“要是找到(孩子)她爹,我病就好了。”

没想到,这份执念,却将秀贞推入深渊。英子出于单纯的善意,促成秀贞与妞儿(她坚信好朋友妞儿就是小桂子)相认。那个雨夜,秀贞匆匆忙忙地给妞儿穿上她早已准备好的衣服,拉着她决绝地奔向想象中的全家团圆,二人却双双殒命于冰冷的车轨之下……

宋妈则代表了另一种人生:

在困境中负重前行。因生计所迫到英子家做奶妈,用自己的乳汁把英子的弟弟养大。四年没回过家的她,日夜思念着自己的孩子,却在计划回家看孩子时,从丈夫口中得知女儿早已送人,儿子小栓子也在一两年前溺水身亡。得知真相的宋妈悲痛欲绝,但现实没有给她纾解悲痛的时间——英子的母亲劝她:“你跟他回去吧。明年生了儿子再回这儿来……你不能打儿起就生了养!”这番早做好的衣服,拉着她决绝地奔向想象中的全家团圆,二人却双双殒命于冰冷的车轨之下……

怀与冷酷的安排,宋妈沉默许久后说:“也好,我回家跟他算账去!”这个“算账”的念头,大概是在失去一双儿女后,能想到的最勇敢的抗争了!

一个雪后的早晨,宋妈坐上丈夫的小毛驴,驮着雪地上踏出一串串清晰的痕迹,林海音用轻盈的笔触写道:“驴脖子上套了一串小铃铛,在雪后清新的空气里,响得真好听。那清脆的铃声,给白茫茫的天地增添了一丝生机,仿佛再说,日子再难也要过去。后来,宋妈生了两个儿子,她虽仍与英子家保持着联系,却始终没有再回去。

《暴雪南风》的悬疑表达与价值升维

芦世玲

近期,悬疑短片《暴雪南风》在网络上引发关注。这部时长仅15分钟的作品,安排两位人物出场,便完整讲述了一个与杀人有关的悬疑故事。影片通过解构式的时间线与超现实元素交织的方式营造悬疑氛围,带给观众沉浸式紧张观感;开放式的结局,让观众在多元解读与猜测间,体味人生的无常与善恶有报的宿命隐喻。细究该片的情节架构、人物塑造与叙事手法,便会发现其类型化特征十分鲜明——堪称一部兼具质感与文艺内核的小成本短片。

1. 短片描述了发生在除夕的一次探访。东北的深冬,下午四点多,天色已然黑透。一名男子形色匆匆地来到陆姨的家门口,在阵阵拍门声中,镜头转至独自坐在屋内缝鞋垫的陆姨。陆姨听到拍门声,关闭正在播报天气的收音机,仔细聆听屋外的声音。时间被按下暂停键,插入一段仅发生在陆姨脑海中的情节。这是一个被无限延展的瞬间。在这一瞬间,陆姨开门让男人进屋,两人之间展开了对话。男人找到陆姨,是因为他发现了妻子的奸情,怒而杀死妻子和其情夫,他想逃跑却不知逃向哪里,听说陆姨会算命,想在绝境中求得一线生机。然而,正如陆姨所言“欠的债都得还”,就在男人的恳求得到陆姨的同意时,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与警笛声,抓捕他的警察已在门外。男人紧张地看向屋外,一只手下意识地掏出枪来,轻拍他的肩膀,无声地阻止男人再生恶端。紧接着,时间回到被暂停的那一瞬,手举针线和鞋垫的陆姨独坐屋内,静静地等待屋外男人停止敲门、转身离去。墙上钟表从停滞到摆动,桌上水杯从静止到冒热气,收音机里天气预报的连贯流畅都表明刚刚男人进屋

的整个过程只发生在陆姨一瞬间的思绪中,而不是真实的存在。

这部短片所表现的犯罪故事与绝大多数犯罪题材的影视作品有所不同。片中没有出现任何有关犯罪现场的画面,观众只能从男人的讲述中自行脑补犯罪发生的时间、地点及作案工具和手法,故事甚至没有交代主人公的最终结局。但创作的巧思就在这里,它以一段插入的情节,通过几组简洁又值得玩味的对话,塑造了一个在恐慌、迷茫中挣扎的在逃嫌疑人的形象,他怀揣着巨大的秘密,来到一个能看穿一切的人面前,企望找到一条生路,但不论是在对方思维里虚幻的一瞬间,还是在现实中寒流将至的大年夜,他都已经无路可去。结尾的多重暗示告诉我们,他最终难逃警察的追捕。

这部短片以封闭的空间、紧凑的时间与极端的天气为叙事底色,串联起正邪对峙、善恶博弈的戏剧张力,塑造出因情感纠葛误入歧途的罪犯形象。片中既融入神秘的民俗符号,又点缀着佛家造像的意象,诸多元素交织碰撞,引出对因果善恶的深层叩问。故事在两位人物的互动中层层铺展,结尾恰似回旋镖,精准呼应了开篇埋下的核心悬念,令观众在惊叹之余回味无穷,甚至生出二刷的兴趣。这正是小众犯罪悬疑短片的极致叙事魅力。

2. 悬疑元素在类型化的影视作品中常见且重要,它用谜团吊起人们的好奇心,牢牢抓住观众的注意力,使观影过程成为一种主动的、沉浸式的解谜体验。

但悬疑远不止于设置谜题,它更像一个能为影片注入多重价值的强大引擎,从多个层面提升作品的观赏性和深度。在悬疑剧《无尽的尽头》中艺校校长万学民性侵害

的叙事线里,胡敏敏这一角色自登场便带有亦正亦邪的复杂特质。面对心怀善意的爱慕者陆声,她的态度始终摇摆不定;随着剧情的深入,她为庇护女儿,从受害者一步步沦为加害者,这一转变也折射出创作者对受害者“以恶养爱”这一生存悖论的深切关注。游湖杀子案中,当观众得知孩子呼噜的童谣,竟是她的亲生父亲在准备杀死她时特意教她的,歌词更是被用来诱导她解救救生衣的扣子时,在恍然大悟之际,也难以避免产生阵阵寒意。而在《隐秘的角落》中,原本明媚悠扬的童谣《小白船》被赋予黑暗的内涵,它既是死亡与杀戮的隐秘预告,也是少年朱朝阳生存困境的反映。

《暴雪南风》中悬疑元素的使用十分直接。单从文本看,它采用省略、暗示、高密度叙事的道具等,实现高密度叙事,营造悬疑氛围。例如,片中并未直接展现犯罪场景,而是通过陆姨与男子之间的对话揭示了犯罪的性质、动机与心理。片中的燃香既是陆姨向神明的敬献,又通过其灰灰的掉落暗示死亡;墙上从停带到挥动的钟摆和桌上从静默到冒热气的水杯,都在表明故事的讲述从虚幻的思绪回到了现实。大量的省略和暗示及象征道具不仅高效利用了时间,更通过留白为观众提供了想象空间。全片最大的悬念,莫过于生与死、善与恶、真与假的对立。男人在拍门没有得到回应后,转身走向远方,此时缓缓响起了警笛声。但响起的警笛声一定能证明他当夜归家了吗?未必。或许在观众的印象中,还愿意多给男人一点时间,让他能够陪伴自己的女儿。

3. 现实生活中,当遭遇具有冲击力的人与事时,人们在产生强烈情绪波动的同时,往往会下意识

识生出“这是真的吗”的反问。这种短暂的否认心态,能够让人们接受残酷现实提供适度的心理缓冲。影视艺术创作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心理现象,通过剖析角色的心理状态与精神世界,借助超现实元素将这类心理过程具象化呈现,进而强化观众的代入感。

超现实元素在悬疑类影视作品中的恰当运用往往能够收获意外之喜。如悬疑剧《漫长的季节》中的“封神”结尾,须发苍苍的王响魂不守舍地穿过一片玉米地,蓦然回首,看见二十年前的自己正开着火车经过。在和自己短暂的、跨越时空的对望中,他心神归原,对驶向远方的自己挥手喊道:“往前看——别回头——”与此同时,老歌响起,面对屏幕中宛若梦幻的画面,观众已是泪眼朦胧。这正是现实主义犯罪题材作品中嵌入超现实元素的别致效果,它用极富感染力的画面外化剧中人物的心理、情绪,非但未削弱犯罪的残酷,反而多了一层厚重感。

《暴雪南风》对超现实元素的运用是大胆又冷静的。它对于犯罪情节的呈现完全是在一个被设定的超现实景象中。在陆姨认定一般的思绪中,观众知道了男人为什么杀人,杀了几个人、什么人等,杀完他想到什么、做了什么,是否有悔恨……尤其是这段思绪中的画面来到最后,警察的拍门声响起,人物的纠结和绝望达到极致,观众的心也随之怦怦作响,导演的镜头一转,果断结束这段讲述,将观众拉回陆姨所在的温暖小屋,所有人都长舒一口气——幸好是假的。紧接着,男人继续拍门,观众知道这才是现实,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猜测刚刚看到的假象是否真的会上演,直到最后根据自己的观点得出结论。在这部短片里,超现实元素的巧妙融入,恰似为一杯清苦的咖啡添入恰到好处的糖。它用超

实的甜度去调和现实的苦,让叙事的韵味更显醇厚。

4.

犯罪题材影视作品的魅力,在于展现人性的复杂、传递正义终将昭彰的内核。这类作品本意绝非渲染罪恶,而是通过揭示犯罪所引发的毁灭性代价,以“反面教材”的形式完成劝人向善的使命。

《暴雪南风》在两个层面完成“劝善”的表达。一是体现在陆姨这一角色的塑造上,她不仅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人物,更充当着道德的审视者与人性洞察者。她以“你把事做绝了”指责男人杀人行径的恶劣;当男人以不堪妻子出轨为由辩解时,她试图点醒他,说“他们罪不至死”;即便男人苦苦哀求救命,她仍继续劝他回头,说“欠的债都得还”……最终,追捕的警察拍门,男人掏枪,陆姨神情严肃地摇头,轻拍男人肩膀,仿佛在说:“回头是岸!”二是在于短片主题的表达。片中引发最多讨论的“宿命”议题,实则是更宏观维度的劝善理念。陆姨曾陷入一段思绪的幻象,洞悉了男人登门的原委。而当她从幻象回归现实,则坚定地选择不开门,让一切自然发生,让命运自然发展。结尾处,镜头缓缓拉远,俯瞰这座被暴雪笼罩的小城,响彻夜空的警笛声格外清晰。这警笛既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庄严宣告,亦是对陆姨此前忠告的呼应。陆姨曾说,男人自由的时间或许只剩一分钟,或许还有一年,但她没有明说的是,时间的长短,取决于他对自身行为的认知与抉择,而“欠债必还”的结局无从更改。毕竟,杀人后,无论逃向何方,都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

至此,短片所诠释的“宿命”,早已脱离了“受命于天”的唯心论调与无力感,转而成为对“人心向善、正义必胜”的凝练注解。影片借由这样的表达,完成了主题的升华。



梅兰芳演绎昆曲《牡丹亭》时的扮相。(图片来源:海南日报)